

## 狮子山下话民主<sup>1</sup>

本文的主角“德先生”，大名民主（Democracy）。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关于他的文章。我俩此次拾前人牙慧，只为看清些“德先生”在香港的现状与未来。香港社会如能“携手踏平崎岖”、“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引自黄霑作词的“狮子山下”），凭狮子山精神让“德先生”在香港开花结果，那既是今日香港的成就，也是当代中国的一大幸事。为此，“德先生”在香港取得的每一进步，哪怕再微小，也值得大家支持与欢呼。

7月1日那天，十几万人上街，和平示威。各方看法不一，不少人认为事件的核心是北京的高压导致“德先生”在香港举步维艰。这种观点恐怕既错估了北京，也错估了香港。我们先从北京的角度简单分析“一国两制”、“爱国”和“普选”（Universal Suffrage）这三个中港关系的关键词。首先，虽然香港人时常担心“一国两制”最终变回“一国一制”，但目前“一国两制”仍是北京处理港澳台问题的唯一战略选项，不可能放弃。北京对香港的影响变大，是内地经济崛起和两地制度、文化差异的自然结果，与政策变化没有必然联系。况且，北京的智慧从来是把当前难以解决的问题交给后人。第二，从邓公到习总，无论左还是右，维护国家稳定是不能跨越的红线。所谓香港领导人必须“爱国”，只是香港领导人不得影响国家稳定的另一种说法。北京的这条红线是否与“德先生”的香港之旅有根本冲突，现在下结论可能为时尚早。第三，北京对普选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过去欧洲各国政府和精英阶层对群众运动的保守态度，是一种惯性思维。<sup>2</sup>普选方案看似兵家必争之地，其实更接近技术性问题。如果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保持甚至提升香港民主自治空间的可能是存在的。

再说错估香港的道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能免俗地相信经济因素是制度转型的主导，“德先生”的沉浮也不例外。社会学家论证过早期资本主义的兴起让掌握更多财富的民众有了更多政治诉求，这是“德先生”沉寂千年后得以重新崛起的根本。<sup>3</sup>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宪政、私人产权和言论自由可能都是空中楼阁，难以想象“德先生”会在这样的经济土壤上重生。同样道理，香港已经具备当代“德先生”几乎所有特征，包括尊重民权（Civil Liberties）、保护言论自由、拥有成熟的法制和媒体。计划中2017年的普选将补上最后一笔，即由普选决定政府。即使普选未能一步到位，也不大可能动摇“德先生”在香港的基础，更无能力反转“德先生”在香港的进程。

大家担心的普选方式，的确是个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不认同一些建制派所谓初选方式不重要的观点。候选人名单是否代表广泛民意，理论上对执政后的政策选择影响深远。但是，我们也不认同“德先生”在香港的命运就完全取决于这最后一步。这让我们想到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有关经济转型的讨论。有一方坚持所谓“休克疗法”，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须

<sup>1</sup> 作者感谢陈庆池和李晋对本文初稿的批评。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的观点。

<sup>2</sup> 即便一些欧洲老牌民主国家，在19世纪末对待“德先生”的态度也是爱恨交加。当时欧洲人民对普选的呼声不可阻挡，但各国的实际进展只能用“龟速”形容。比利时、英国、荷兰、挪威和瑞典的合法男性选民占男性比例没有一个超过一半。即便在精英阶层，也有不少人担心“德先生”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执政能力（参见英国历史学家 Eric Hobsbawm 在“帝国时代”（The Age of Empire）一书中的记载）。不必质疑这些精英的人品，他们只是批评“德先生”的那些古希腊智者（比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升级版而已。

<sup>3</sup> 参见 Michael Mann 和 Dietrich Rueschemeyer 分别在 90 年代写过的文章。

一步到位。一个著名的论调是“人不能分两步跨越一个峡谷”。回头看那时的争论，不免觉得有些意气用事。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虽有崇山峻岭的阻隔，但并不存在非要一步跨越过去的大峡谷。渐进模式固然有各种问题，但至少提供了一条到达彼岸的路径。“德先生”在香港已拥有坚实的基础，并非只是形而上的存在，普选方案之间也没有必须一步跨越的鸿沟。“德先生”经历沧海桑田，从最初全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直接民主到今天流行的代议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如果不懂变通，恐怕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德先生”在香港的旅程只是一个开始（虽然相比其他地方已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开始），大家需要一些耐心、宽容和自信，看他一路走下去。

现在看来好像云淡风轻，但是“德先生”的香港之旅确实容易引发吉凶未卜的风波。首当其冲的是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内地对香港经济总量的贡献，问题出在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保证所有香港人的福利都有改进。美国人对中国的批评主要不在经济层面，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受益于廉价的中国商品，受损的只是传统制造业，而制造业就业人数只占美国就业总数的十分之一。香港就不同了。中国经济崛起虽然让以金融、地产、旅游和零售为支柱产业的香港经济获益良多，但对大多数市民的福利影响往往是间接的。从草根阶层感同身受的直接影响来看，他们反倒可能更看重租金上涨、部分商品短缺（例如奶粉）、交通市容环境恶化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即使无关“德先生”，出于完全自发的自我保护，地域主义也会抬头，比如有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土生土长的市民至今还存在针对“外地人”的歧视。不过，由于政治、社会制度的差异，香港的这些问题有时被过度拔高。回顾历史，“德先生”的成长时常伴随保护主义的抬头。保护主义或许可以暂时缓解某些社会矛盾，但很可能损害经济的长远发展。对于以“自由港”为核心竞争力之一的香港经济而言，这种风险尤其值得注意。

另一个风险是民族主义。目前“香港人优先”等团体虽不代表主流民意，但却体现了香港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德先生”一路走来，身边常出没着民族主义的幽灵。<sup>4</sup>以法国大革命为例，皇权解体后出现了权力真空，争取民意成为民主政治的头号任务。为“德先生”而战的革命者们很快发现，争取民意不如操纵民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则是一条捷径。于是，指控对手勾结莫须有的外部势力成为常用的攻击武器，而证明自己清白的最佳手段是塑造一个更加可怕的外部势力。所谓的外部威胁最终在民族主义的胁迫下自我实现，而滑铁卢也成为法国永远的噩梦。再以德国为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民族主义就曾与“德先生”亲密接触。今年是“一战”的百年祭。战争的缘由依然没有定论，但横扫德国的民族主义肯定是战争全面爆发的重要因素。“一战”前的德国已经有了普选，是个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普选出来的政客们蓄意夸大外部威胁，营造德国被孤立和被抑制的悲情，成功地用民族主义压制住了以工人运动为主的内部矛盾。逐渐失控的民族主义让德国卷入一次次领土冲突，最终却陷入一战的深渊。

有人可能会问，香港人也是汉族同胞，何来民族主义？其实，民族主义可分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和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香港人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又高度认同和恪守异于大陆的政治、法律体系，并以此保护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这完全符合公民民族主义的性质。回想法国、德国，即便没有外部压力，“德先生”的到来也激发了严重的

---

<sup>4</sup> 参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Jack Snyder 题为“从选举到暴力：民主进程与民族主义的斗争（**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的著作。

民族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制造了一个硝烟弥漫的欧洲大陆。再回想百年前的中国，“德先生”和民族主义的互相交织不仅推翻了大清王朝，而且导致了社会的大震荡并最终由共产党起来收拾残局。香港当然不可能出现军事化的民族主义。而且，从乐观的角度讲，香港已有比较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德先生”的香港之旅更有可能走英国道路。但是，民族主义造成的冲突是多元的。由于前面提到的经济因素，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可能相互加强，导致香港与内地出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摩擦。

“德先生”香港之旅的第三个风险便是把香港变为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与百多年前相比，更加复杂的情况是“德先生”的泛意识形态化。一些“德先生”的极端粉丝相信他凌驾其他政治制度之上的无条件的优越性，并将其他制度的拥护者视为异教徒。这种傲慢与偏见世界各地都有，香港也不例外。由于香港的民主进程牵涉到世界上最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全世界“德先生”的信徒开始关注香港，如同中世纪的基督徒关注十字军东征路上的安条克（Antioch）或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于是就有这样的疑问，香港7月1日的游行是否应该更加激进？<sup>5</sup>过去，暴力常为“德先生”开路。<sup>6</sup>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是否还需要“闹事”与“流血”？香港是否要卷入这场“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斗争？这是值得每一个关注香港和中国前途的人思考的问题。

“德先生”的精髓是基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公共决策，而非意识形态斗争的利器。英国一向是“德先生”的重镇，自然深谙此道。不像百年前行事鲁莽的法国、德国，英国总是小心翼翼地权衡利弊，很少被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支配，也不大有向殖民地出口“德先生”的意愿。所以，纵观历史，务实的英国从不轻启争端，也没有在任何重大战事中站错队（美国独立战争大概是唯一的例外）。相比其他国家，“德先生”在英国的道路也可算安稳，分几步跨越了那个“峡谷”。英国可以进退自如，寻找适合自己的最佳道路，香港为何一定要盯住一个并非生死攸关的普选目标，捆住自己的手脚呢？

在民主进程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保持理性的光辉，选择恰当的道路。“德先生”成长过程中学会的变通精神，不应在香港之旅中被遗忘。支持“德先生”当然有理由骄傲，但骄傲不同于自居道德制高点的偏执。我们当然要坚持光荣与理想，但也要避免光荣与理想蜕变为傲慢与偏见。其中微妙的平衡，考验着大家的品格与智慧。

宋铮，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经济学副教授，获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复旦大学。

赵扬，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获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经济学博士。曾任香港金管局外事部经理，以及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

---

<sup>5</sup>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14, Uphill Fight for a Territory's Democracy Movement.

<sup>6</sup> 引用独立宣言作者、美国总统 Thomas Jefferson 的两句名言：“不幸的是，人类为重获他们失去已久的自由而付出的努力会伴随暴力、错误甚至犯罪。过程让我们落泪，但我们必须为结束这一切而祈祷。”